

除了查重率,还多了“AI率”—— 当毕业论文变成“文字闯关游戏”

■本报见习记者 赵宇彤

“没想到,我才是‘人机’。”

看着70%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检测率(以下简称AI率),以及电脑屏幕上满屏飘红的检测页面,某高校研三学生周星(化名)又气又笑:“我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论文,却被检测成人工智能(AI)写的。”

在社交媒体上,跟周星一样“喊冤”者还大有人在。“百分百手写的摘要,一查AI率是99%”“AI写的没测出来,自己写的却被标红了”“让AI测AI率,再用AI降,太可笑了”……

又到一年毕业季,今年除了查重率外,AI率作为毕业生们需要跨过的另一道槛,不仅拦住了不少硕博研究生,还有部分学校对本科毕业论文也提出了AI率的要求。未通过检测者不仅面临二次检测、推迟答辩,甚至还存在延毕的风险。

在毕业生们面对“新形势”不知所措的同时,某些不良商家也察觉到了“商机”。一条“检测—降低—再检测”的灰色产业链正在暗处滋生,这其中的每个环节都反复“收割”着毕业生的钱包和情绪——付费检测、付费降AI率。毕业生们在面对论文内容泄露风险的同时,也难免“文财两空”的结局。

然而,AI检测有必要吗?其背后的原理是否靠谱?在AI时代,高校人才培养与考核方式又该如何调整……AI率的争议背后,我们还有更多问题需要追问。

我是人,还是AI?

发现自己AI率不合格后,周星花了四五天的时间,终于把AI率从70%降到32%。

周星所在学校有明文规定,如果毕业论文的AI率在40%以上,毕业生不得进入答辩环节。他费了好大劲儿,才勉强达到这一要求。

在当下的高校中,如周星这样连过盲审、查重等数道关卡后,却在论文AI率处被“亮红灯”的学生并不在少数。不过,虽然结果相似,但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却有很多:“为什么致谢都会被检测出AI生成内容,难道世界上还有另一个我?”“我手写,手改的内容被标红了,经AI润色的内容却没有被标红,难道我才是AI?”“知网测出的AI率是9%,维普测出的是13%,学校给出的结果却是34%,我到底该信谁?”……

随着AI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日渐普及和深入,为避免学生对AI的过分依赖,防范学术不端行为,不少高校开始对AI工具介入学术的尺度进行干预,将AI率纳入毕业论文审核体系便是其中之一。

2024年11月,复旦大学教务处发文,对学生使用AI工具提出细化要求和惩处措施,这成为国内首个“AI禁令”。

除复旦大学外,北京师范大学也要求学生在生成AI完成作业时,必须对相关标注进行标注,同时AI直接生成的内容不能超过全文的20%。天津科技大学、江苏大学、南京财经大学等高校也规定,如果本科毕业论文的AI率超过40%,其所在学院将向学生发出警告,要求学生自查自纠,毕业论文经修改后,再由学院统一在相关平台检测通道进行复检。四川大学要求文科的论文AI率必须低于20%,理工科和医科的AI率更是要低于15%。

百分百手写的摘要,却被AI判定为AI所写,而降低“AI率”,就要把自己的稿子改得“既不像人话,也不像AI”。当毕业论文变成一场“文字闯关游戏”,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AI检测对学生毕业论文的介入?



图片来源:视觉中国

此外,还有部分高校虽然没有明确AI率的具体数值,但出台了相关的政策要求。比如,中国传媒大学便要求学明确毕业论文中是否使用了生成式AI,以及具体的使用情况。

至于学生使用哪个平台检测AI率,不同学校也有不同规定。

据介绍,当前市面上常见的AI检测平台包括知网、万方、维普、PaperPass、PaperYY等。这其中,知网和万方的AI检测价格为每千字两元;维普以篇计算,通常为每篇30元;PaperPass和PaperYY则有免费版和收费版的区别。

“不同平台,其检测结果并不相同。同一篇论文,我在知网的检测结果只有2.4%,但用PaperYY的检测结果却将近60%。”国内某高校大四学生小艾告诉《中国科学报》,由于不能确定学校使用的检测平台,为保险起见,她只能在不同渠道反复检测,无形中耗费了大量精力和财力。

除学生外,“受害者联盟”中还有不少老师,

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董晨宇便是其中之一。

在一篇网络贴文中,董晨宇说自己即将发表的一篇文章在PaperPass检测的AI率竟高达82.54%。“最可笑的是,里面大部分高度疑似AI生成内容的部分,是在讲田野故事。”

更多的问题则出现在老师修改学生论文的过程中。

“我在修改学生论文时,发现错别字和不通顺的地方很多。我很生气,打回去了想要发火,但他们却说是故意这样写的,就是为了通过AI查重”“我帮学生修改的学术化语言,全部被标注成AI”……在一篇吐槽AI论文检测的帖子下,不少老师纷纷现身,大吐苦水。

“算法黑箱”下的误伤

在和AI斗智斗勇的过程里,周星总结了一

套降低AI率的“秘籍”。

“首先是删除论文中逻辑性强的内容,包括首先、其次、最后、因此、然后、一方面、另一方面等,再删掉总结性词汇,比如以上、综上所述、总的来说等,最后还要把短句尽量合并成长句,让文章整体的表达更加口语化。”他说。

事实上,目前社交媒体中已有不少关于降低AI率的经验分享。在这些“经验”中,有人被迫删减内容,有人反复修改,有人故意往“笨”里写,有人甚至调侃是不是“火星文”就能避免误判……

“总之,就是改得既不像人话,也不像AI。”小艾叹了口气。

“论文AI检测本质上是在技术尚未成熟时,一场略显仓促的‘学术安检’尝试。”在接受《中国科学报》采访时,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赵斌直言,这种高度依赖“算法黑箱”的判断依据,本身就不够科学、严谨,极易带来大量“误伤”。

对此,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凌翔也表示:“现在的一些AI检测器是由AI数据和真实数据训练出的二分类模型。其判断内容是否由AI生成的方式,就是将大量AI生成的文本与人类创作的文本‘喂’给同一个模型,使其不断训练、迭代和优化。”

“如果论文的语言风格过于工整或模板化,缺乏跳跃性思维或非典型结构,或者语言表达过于中性、缺乏个性,句式结构趋同,爱用某些高频词等,都更容易被判定为AI生成。”吴凌翔告诉《中国科学报》。

不过如此一来,一个悖论随即产生——AI生成内容的基本逻辑是基于人类创作的文本,模仿人类思考模式,其对逻辑性、规范性的要求与学术写作的标准高度契合。从这个角度看,越是规范、严谨、逻辑化的学术表达,越容易被“误伤”。

因此,AI率对论文“一票否决”的方式并不靠谱。正如学者所言,该方式成立的一个基本前提是,是人类创作的文本与AI生成的内容存在一定差异。然而,随着AI技术的持续进步,这种差异正在快速缩小,甚至趋近于无。在此背景下,这种“宁可错杀一千,不能放过一个”的“围剿”,只会让学术写作异化成“文字闯关游戏”。

“AI在学习和模仿人类,人类却在努力不被AI定义为‘AI’。”周星摇了摇头,这就像左脚踩右脚,“那学术训练的价值何在?”

学术诚信,还是学术生意?

被拦在AI率门槛之外的人群中,还有少部分人没有周星幸运。

“在我的论文里,很多专业表述被标红了,这些内容是不能轻易改动的。然而,仅仅通过调整句式又不能把AI率降到要求范围内。”大四学生陈夕(化名)所在的学校要求,毕业生的论文在维普系统中检测的AI率必须低于30%,否则便不能答辩,如果两次均未达标就会延毕。

陈夕已经“浪费”一次机会了。

一筹莫展之际,陈夕收到了一条私信:“降AI,降重,纯人工手动,不会改变原文结构,不会曲解原文意思,全程保密,包售后,通过为止!”尽管有朋友劝阻,但陈夕还是抱着“病急乱投医”的心态,将论文交给了对方。在缴纳近百元的费用后,她得到了一份让人啼笑皆非的结果。“很多表述完全变成了流水账,简直不像是一篇学术论文。”她告诉《中国科学报》,为了逃过AI的“法眼”,论文中的某些句子后面甚至加了不少“哦”“呢”等语气词。

感觉受骗的她想找对方理论,却发现自己早已被拉黑。

无奈之下,陈夕决定“用魔法打败魔法”,用AI工具降AI率。她学着网上的指令,“将整段文字通俗化,重新组织语言,替换形容词,不改变原文意思,确保思路清晰且内容递进,使用简单、直接的表述,不用语气词,保留学术性,减少AI痕迹,降低查重率”,先将论文交给人工智能软件“豆包”,再一点点手动调整,终于在截止日期的

下午通过了AI检测。

在此过程中,陈夕内心一直充满着焦虑。虽然目前并非所有学校都采用AI检测,这种焦虑情绪却已经在高校学生中大范围蔓延。

“如果算法无法精准区分‘合理引用’与‘机械拼凑’,学生就很可能被迫陷入‘防查焦虑’,为规避所谓‘AI风险特征’而反复修改文字表述,甚至不惜以付费方式‘洗稿’,这俨然成为了一种内耗。”赵斌告诉记者,而这种检测标准的单一化,会让学生过度关注“是否AI生成”,而无限打磨论文的思想深度,甚至会消解写作的创造性,“最终只会培养出一群‘学术化妆师’,真正的学术训练反而被边缘化”。

除此之外,这份焦虑也喂养出一个新职业——“降手”,即那些收费帮助毕业生降低论文AI率,并进一步兜售焦虑情绪的人。由此,一条“检测—降低—再检测”的产业链正在暗处滋生。

记者在调查中发现,“降手”的水平参差不齐,其降低论文AI率的方式大多是调整句式、词语等。也正因如此,对“降手”的学历和专业背景并没有过多限制,其收费模式则主要看被标红、需要修改的字符数量,通常为“1000字10元”。此外,一些查重和AI检测平台也纷纷推出“降AI率”套餐,用户付费检测后,还可以付费降AI率,主打“一条龙服务”。

“现阶段,过分依赖AI检测的行为,更像是为了行政管理‘便捷’而实施的形式主义,其负面影响大于实际收益。”赵斌严肃地说。

杜绝“AI时代的摆烂”

面对迅猛发展的AI技术对于教育领域的冲击,出现“防火、防盗、防AI”的应激反应似乎在所难免。然而,要想用一套确定性方案完全消除AI的负面影响,则无异于技术迷信。

“从本质上说,AI应当是辅助人类思考的工具。我一直鼓励学生在AI的帮助下完成思考和写作。”赵斌告诉《中国科学报》,如果直接复制生成内容,跳过理解和转化的环节,对AI生成的内容不加消化、不做思考,只做“信息的出纳”,那无疑是“AI时代的摆烂”。

反之,如果学生能吸收AI提供的观点、信息或初步框架,再经过自身理解、批判和转化,将其融入自身的知识体系和思考脉络中,才是真正的高效科研。“AI能提供新的视角,播下思考的种子,实质性提高创新效率,加深表达深度,这是一种基于人机互补的认知升级。”赵斌说。

因此,摆烂和高效科研之间有着明确边界——前者是滥用AI导致的思维惰性;后者则是善用AI激发更活跃、更深入的思考。“在整个过程中,人依然是主导,AI只是增强手段。”赵斌举例称,比如同样用AI生成文献综述,“摆烂者”直接粘贴;研究者则会标注“该观点的局限”并补充实证数据。“这些‘人类专属’的思考批注就是最鲜明的边界标识。”

因此,对AI率的监督滥用问题,赵斌认为不必过度焦虑,更不能本末倒置。“学术评价的基石始终是内容的真实性、方法的严谨性、结论的可靠性和创新性。文字表达只是最后一步。”他强调,通过老师指导、写作工作坊等人文手段帮学生建立扎实的学术规范意识,这才是治本之策。而仅靠AI堆砌的“学术速食”自然会在严谨的学术质检中现形。

正是有了上述认识,在日常的教学实践中,赵斌格外注重5种“AI时代生力”的培养——提出问题能力、信息挖掘能力、AI时代的批判能力、人机互补能力和深度表达能力。

“在AI时代,识别信息的真伪、洞察逻辑的漏洞、评估论据的有效性都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。”赵斌表示,而带有“幻觉”或偏见的AI生成内容也自然成为学生的训练场——让学生在“找碴儿”中锤炼批判性思维,破除技术迷信。

“与其用不靠谱的AI检测把论文文,不如回归本质问题,即写作的内容是否真实,研究方法是否扎实,研究结论是否可靠。”赵斌说。

“玩”水果,还可以为学术减压?

■本报记者 温才妃

眼前的情景或许难得一见——研究生们一人手捧一个鸭梨。北京理工大学博士卞宏达一声令下,大家开始吃起来。

有的人吃得格外卖力。“能者多劳,导师最喜欢这样的学生,吃完了再奖励你一个。”卞宏达幽默地点评道。有的人却慢慢细品,说明“有自己的科研节奏”。有的女生觉得梨子太大吃不完,把吃了一半的梨子塞给旁边的男朋友,这叫“合作分工”。

“鸭梨的谐音是‘压力’。同学们,吃梨是不是比做科研的压力小很多?”卞宏达问道。

“的确是。”研究生们哈哈大笑。

用水果类比做科研,这究竟是什么活动?台上这位光头博士究竟想干什么?

200多个名额一分钟被抢光

“同学们到了,可以先嗑瓜子。瓜子皮放边上,别扔地上就可以了。”今天的卞宏达戴了一顶南洋风情的爵士帽,腰间别着扩音器,拎着两袋瓜子在学生中间来回分发。

来嘉兴大学“启思空间”参加活动的研究生,人人面前摆着一份干鲜果品,包括一大把瓜子、一个梨、三个枇杷。有的学生听完一愣,有的学生则快速进入状态。不一会儿,嗑瓜子的声音此起彼伏。

“做课题、写论文,做着做着就会疲倦。我想搞个活动,帮学生从繁忙的科研任务中暂时抽离出来,享受一个没有那么卷的上午或下午时光。”学生们一边嗑瓜子,一边听卞宏达介绍自己搞“学术水

果减压大餐”活动的初衷。

2023年,卞宏达在北京大学访问学者期间,曾兼职做过中国农业大学的心理咨询师。当时,他第一次尝试相关活动时遭遇了“滑铁卢”。“我把活动名称定为‘学术韧性’或‘导生沟通’,报名人数是个位数。”

怎么把研究生吸引过来?他想到了“吃水果减压”的研究。人体在吃东西的时候会分泌多巴胺,不需要太多热身,情绪自然会变好。门槛低、成本低,也足够接地气,像这样针对科研压力问题的团体心理活动,在国内高校中几乎没有。

他兴奋地把吃水果的想法告诉了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辅导员陈楚莎。“同学们,喜欢吃水果吗?4月2日来学院活动室吃水果。”他们激动得还没等想好活动名称,就发送了一条简单的信息。这条信息迅速吸引了120名研究生报名。

这还不是最快的,在桂林理工大学做活动时,“学术水果减压大餐”曾创下200多个名额在一分钟之内被迅速抢光的纪录。2025年4月至今,该活动已经在西北工业大学、广西师范大学等7所高校举办过。

吃水果真的能“解压”吗

吃水果真的能缓解科研压力吗?看看他们是怎么玩的。

第一关,一口吃一个准——嗑瓜子大赛,数瓜子仁儿,限时3分钟。



“学术水果减压大餐”活动现场。受访者供图

嘉兴大学材料与纺织工程学院研究生沈楹洁嗑到了一个坏瓜子。“你是怎么处理的?”卞宏达问。“我扔了。”沈楹洁回答道。

“坏瓜子可以扔,但课题做不下去,敢扔吗?”卞宏达接着问。“课题不能随便扔,但遇到问题可以分解,一步步解决。”沈楹洁回答。“还可以给师弟呀!”卞宏达幽默地接话,全场笑作一团。

第二关,把压力吃下去——吃梨,限时60秒。

“这位同学,你为什么把梨藏起来?”卞宏达问。“我吃不下了。”这位女生回答。“快把梨拿出来让大家看看,不然你该触触网络热梗,意思是背后议论你了。摆烂不可行,躲得过初一,躲不过十五。直面压力才是最有效的解决途径。”卞宏达劝慰道。

金句频频的背后,卞宏达全靠现场发挥,这与他平日常刷抖音、小红书、豆瓣、哔哩哔哩等新媒体平台无关系。

第三关,把烦恼吐出来——吃西瓜,数西瓜子,限时3分钟。

“同学,你们的解压方式是什么?不能重复,要注重创新性。”“吃零食、逗毛茸茸的小动物、打麻将、做手工、睡觉……”在北京理工大学长三角研究院(嘉兴),前来参加活动的研究生围成了一个圈,挨个儿说。

电磁场与无线技术博士罗壹允在本轮胜出,捧走了一个大西瓜。他在“获奖感言”中总结了三个要点,一是拿到了子多的西瓜,“自己运气好”;二是不要吞子,“这就好比科研中遇到困难要说出来”;三是规定时间内吃完,“在有限时间内完成科研”。

一场小小的吃水果活动展现了不同高校学生的性格。在很多高校,道具——梨、西瓜还没等到对应的环节,就被嘴馋的学生悄悄吃掉了。而北京理工大学的研究生即使表达了想提前吃西瓜的意愿,且被卞宏达允许了,也还是忍着没吃。“即便是渴,也坚持原则。这就是北理工培养的人才特点——高度遵守纪律。”

还需要时间成长

不少学生是背着导师悄悄参加这个活动的。有一回,一名学生刚刚嗑上瓜子,就被导师的一通

电话叫回了实验室。卞宏达只好让他把水果“打包”带走。

“团体心理建设活动走进我国研究生群体还需要时间。”卞宏达告诉《中国科学报》,国外的心理疗愈以冥想为主,进入状态较慢,一般需要坚持一个月,互动性较弱。“事实上,很多学生的压力尚未发展到需要心理疏导的程度,团体活动在预防、提前把压力消化掉是一种更高效的方式。”

罗壹允原本以为今天的活动类似趣味运动会,但身处其中却发现更像是茶话会。“它和以往参加的社团活动不太一样,之前大家只是单纯地玩、结束了各自散去,这个活动和科研流程紧密结合。这是与普通解压活动最大的区别之一。”

在“学术水果减压大餐”中,学生既是观点的倾听者,也是交流者。“有些同学习惯了沉默,即便参加活动也一声不吭。这时候,即便不指出他的问题,他也能看到身边的榜样行为。”卞宏达说。特别是在最后分享解决方法的环节,每个人都要思考解决对策,都会相互启发。

不过,这毕竟只是一场活动,“娱乐”过后,压力过大者还是会回到原点。在现场,卞宏达遇到过不少心理压力过大的学生。“我告诉他们预约学校的心理咨询师,看看是否需要多方联合帮扶或接受专业治疗。”

他还在不断收集创新的方向。有一次,他有意隐去“水果”二字,把“学术减压大餐”发在朋友圈,让大家填空。“水货、水军、牛马,旅行、音乐、减肥……”大家脑洞大开。“我个人最喜欢‘水手’这个词,用水手比喻研究生再合适不过了。这些主题灵感也为我下一步拓展方向打开了思路。”

嘉兴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刘巧芝表示,这场寓教于乐的活动足以举一反三,向学生传授更多可迁移的压力应对技能。“我们期待这次是水果,下次是音乐、山水等,让活动形式更加丰富。”